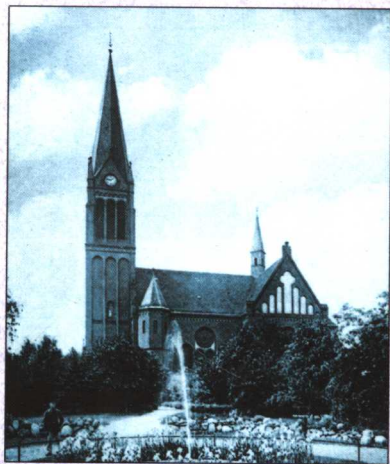




高等院校翻译专业必读系列



TRANSLATION

翻译批评

—从理论到实践

温秀颖 / 著

南开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翻译批评:从理论到实践 / 温秀颖著. —天津: 南开大学出版社, 2007. 1

(高等院校翻译专业必读系列)

ISBN 978-7-310-02661-6

I. 翻... II. 温... III. 翻译理论—高等学校—教学参考资料 IV. H0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00239 号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出版人: 肖占鹏

地址: 天津市南开区卫津路 94 号 邮政编码: 300071

营销部电话: (022)23508339 23500755

营销部传真: (022)23508542 邮购部电话: (022)23502200

*

河北省迁安万隆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07 年 1 月第 1 版 200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880×1230 毫米 32 开本 8 印张 2 插页 221 千字

定价: 20.00 元

如属图书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营销部联系调换, 电话: (022)23507125

翻译批评在我国究竟有着怎样的历史沿革？在翻译研究中到底处于何种地位、起着怎样的作用？改革开放以来的翻译批评研究取得了哪些具体成就？还存有哪些问题？当前的翻译批评家和翻译研究工作者还需要做哪些工作？未来的翻译批评会呈现出何种样态？具有怎样的特征？

本书对中国翻译批评实践的历史演进，特别是翻译批评理论研究的发生、发展和现状进行了详细的梳理与考察，并对梳理和考察的结果进行了系统的分析，提出了认识 and 解决问题的途径，并对未来的翻译批评进行了瞻望——未来的翻译批评应当是一种“圆形”的批评，它必须具有多元性的开放视野、民族性的传统意识、建构性的学术追求。唯此翻译批评才能以自身的存在，对当代翻译事业乃至中国社会发挥重要而独特的文化影响，才能在新世纪成为翻译研究的一个分支学科。



作者简介：

温秀颖，生于 1966 年，河北宣化人。现任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研究生导师。1984—1988 年就读于河北师范大学外文系，1994—1997 年就读于南开大学外文系，1998—2003 年就读于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毕业后获博士学位。2004—2006 年应邀赴美国路易维尔大学讲学。迄今发表学术论文 10 余篇，出版各类教材 10 余部、译著 5 部。目前主要从事翻译理论与实践、翻译批评和古典文学名著英译的研究。

序 言

在我国，近一二十年来，作为独立学科的“翻译研究”在发展，作为翻译研究组成部分的“翻译批评”也在发展。一些学者放开思想，纵横搜览，古学历史，外学西方，潜心研究，卧薪尝胆，出了一批关于翻译批评的文章和著作，探索翻译批评的本质、原则、功能、标准和方法，多层次多角度地研究翻译批评的基本理论问题，正在朝着建构翻译批评体系的方向努力。

1992年，许钧率先出了专著《文学翻译批评研究》；1999年，周仪和罗平出了《翻译与翻译批评》；同一期间，姜治文和文军出了《翻译批评论》；2000年有马红军的《翻译批评散论》；2005年有杨晓荣的《翻译批评导论》和文军的《科学翻译批评导论》；2006年又有王宏印的《文学翻译批评论稿》和王平的《文学翻译批评学》。还有一些著作，虽未以“翻译批评”冠名，但与翻译批评性质相关或相近。再加上在刊物上登载的关于翻译批评的论文和在翻译教材里开辟的关于翻译批评的专论，其数量很是可观。有这么多学者带头研究翻译批评，有这么多著作相继问世，这是翻译研究在我国迅速发展的标志。

青年学者温秀颖，历时近七年，完成《翻译批评——从理论到实践》这一课题的研究，遂以此加入翻译批评研究的学术行列，为活跃我国的翻译研究做了一件有益的事情，这是很可喜的。

《翻译批评——从理论到实践》集中讨论了四个方面的问题：翻译批评的本质，翻译批评的主体和客体，翻译批评的标准，翻译批评的方法。这些都是翻译批评研究的重要问题。温秀颖在研究的过程中，表现出青年学者的良好素质。他立志学习、借鉴前人和今人的学术成果，广收博览，阅读已有的和凡能得到的有关翻译批评的资料，为这本书的写作作了充分的文献准备；他运用辩证的方法，以发展变化的观点，全面

考察研究对象,客观分析具体问题,在对宏观或微观问题的研判上,避免片面性;他独立思考,敢于阐发,既能虚心向别人请教,又能坚持自己的见解。

他对中国翻译批评实践的历史全貌作了详尽的考察、缜密的梳理和客观的分析,看到目前我国翻译批评实践和理论研究有了很大的发展和进步,如吕俊所说,呈现出“从传统批评走向现代批评”、“从一元性走向多元性”、“从文本批评走向社会—历史批评”的态势。同时也指出,仍有一些问题需要作进一步的思考和探讨。如,翻译批评在我国历史上的发展脉络是怎样的一种状况,对这种状况应该如何认识,改革开放以来的翻译批评研究取得了哪些成绩,还存在什么问题之类。对这些问题作进一步的研究,是为了使传统译论中一些至今“仍具有生命力的概念和范畴与当代翻译理论融合起来,整合成一个既具有我国民族特色的传统范畴,又具有科学性的当代形态的翻译批评理论体系”。在展望今后翻译批评研究将会展现怎样的特征时,作者提出,未来的翻译批评应当“具有多元性的开放视野;民族性的传统意识;建构性的学术追求”,才能使其成为学科意义上的翻译研究的一个分支。

2

作者在论述了翻译批评的本质、翻译批评的主体和客体之后,用较多的篇幅讨论了翻译批评的标准和翻译批评的方法。在讨论翻译批评的标准时,作者特别论述了翻译批评标准与翻译标准之间的区别与联系,并在借鉴前辈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讨论了翻译批评标准的诸多特殊性质和批评标准应用于批评实践时的各种制约因素,值得关注。在讨论翻译批评的方法时,作者指出,目前存在简单照搬西方翻译批评理论与方法的现象,因而难以产生有明确理论主张和稳定的翻译批评学派。翻译批评方法应是哲学的,逻辑学的,同时还应是符合翻译批评自身需要的。它应该是“以哲学层次上的方法为宏观指导,以逻辑学层次上的方法为思维工具,以具体学科层次上的方法为操作手段,三者互相联系、互相补充,缺一不可”,并“以翻译自身的规定性作为调节机制来一以贯之,即各层次的翻译批评方法都必须是以翻译为本体的”。而翻译批评关注的是译作的实际效果及其对译入语读者乃至社会所产生的影响。

《翻译批评——从理论到实践》是一本比较全面论述翻译批评的新

著，作者以辨证的方法考察我国传统翻译批评的历史，审视西方翻译批评的理论，正在朝着构建具有“历史的民族视野、现实的发展视野与新学科的多元视野相融合”（屈雅君，1997）的翻译批评理论的方向努力。其间，在一系列问题上展示了自己的视角，阐发了自己的观点；同时，在有些问题上，因受主客观因素的制约，也难免有观点偏颇、论述失当之处，此时便需要专家和读者的批评。

学术的繁荣需要年轻学者的参与，而年轻学者的成长，除了个人的努力，还需要一个好的学术氛围和学术团队的栽培。希望温秀颖向在翻译批评方面已有建树的专家学者学习，向广大读者学习，继续实践，和大家一起，为推进我国的翻译批评研究事业继续努力工作。

刘士聪

2006年10月

前言

中国翻译的历史可谓源远流长，从西汉的佛教翻译开始到 21 世纪的今天，绵延达两千年之久，经历过高潮与低潮的洗礼，产生过深邃卓越的思想。应当说，今日之世界，谈翻译，谈翻译研究，忽略中国的存在，没有中国的声音，是不全面的，也是不可能的。中国的翻译思想体现了中国的文艺创作思想，也体现了中国的文化，因而它也是整个中国文化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面对日新月异的世界译坛，我们不可盲目自满，更不可妄自菲薄。两千多年的历史积淀，我们的前辈翻译家们给我们留下了浩如烟海的译作和无数弥足珍贵的翻译思想。这些译作和思想不仅是翻译研究工作者，而且是所有从事比较文学研究、文化研究史研究、思想史研究的人的宝贵财富，是我们今天融入世界，与世界展开对话的历史起点和现实起点。

翻译批评，作为构成整个中国翻译史、翻译思想史、翻译研究史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从支谦到钱锺书，曾吸引了无数翻译家、文学家、思想家和哲学家的注意力。他们一方面紧握批评的手术刀，对古往今来的翻译活动条分缕析，一方面高举理论思考的计量尺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层面为翻译批评确立坐标系。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随着翻译活动的多元化及翻译研究的科学化、学科化，对翻译批评的理论化诉求也越来越强烈，从而引发了中国译界对翻译批评的普遍性焦虑，关注翻译批评的译界人士逐年增多。特别是 20 世纪 90 年代后，不少学者开始从宏观上对翻译批评的本质、原则、功能、标准和方法等基本理论问题进行积极的探索，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就，同时也生发出更多新的值得思考的问题，如：翻译批评在我国究竟有着怎样的历史改革？在翻译研究中到底处于什么样的地位？起着怎样的作用？改革开放以来的翻译批评研究取得了哪些具体的成就？还存在着什么样的问题？当前的翻译批

评家和翻译研究工作者还需要做哪些工作？未来的翻译批评会呈现出什么样态，具有怎样的特征？这些都是需要我们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正是在这样一个学术大背景下，本书作者选择了“翻译批评——从理论到实践”这一课题，从历时和共时两个角度，对中国翻译批评实践的历史演进，特别是对翻译批评理论研究的发生、发展和现状进行了详细的梳理和考察，并对梳理和考察的结果进行了比较系统的分析。通过分析，我们发现，目前我国的翻译批评实践和翻译批评理论研究较之从前，尽管有了长足的发展和进步，但仍然存在着概念混乱、认识不深、视野狭窄、方法单一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我们进行了力所能及的整合和深化，提出了自己的认识和解决问题的途径，并对未来的翻译批评进行了瞻望。我们认为，未来的翻译批评应当是一种“圆形”的批评，它必须具有多元性的开放视野、民族性的传统意识、建构性的学术追求。只有这样，翻译批评才能以自身的存在对当代翻译事业乃至中国社会的发展发挥重要而独特的文化影响，才能在新世纪成为翻译研究的一个分支学科。

目 录

、 绪论	1
第一节 翻译批评研究的传统理论基础	2
第二节 翻译批评研究的当代视野	7
第三节 翻译批评研究的框架	18
第一章 翻译批评的本质	27
第一节 什么是翻译批评	28
1.1.1 什么是翻译	28
1.1.2 什么是翻译理论	33
1.1.3 什么是翻译批评	36
第二节 翻译批评的功能	42
1.2.1 激励和监督功能	42
1.2.2 价值判断功能	44
1.2.3 阐释功能	46
1.2.4 审美功能	47
1.2.5 建构协调功能	51
1.2.6 社会政治功能	53
1.2.7 人际功能	56
1.2.8 宏观调控功能	59
第二章 翻译批评的主体和客体	65
第一节 翻译批评主客体的概念	66
第二节 翻译批评的主体	67
2.2.1 中国译界对翻译批评主体的认识	67
2.2.2 翻译批评主体的构成	72
2.2.2.1 读者	74

2.2.2.2	专家、学者·····	75
2.2.2.3	翻译家·····	81
2.2.2.4	三种不同批评之间的关系·····	83
第三节	影响翻译批评主体的几种心理效应·····	85
2.3.1	从众效应·····	85
2.3.2	名人效应·····	86
2.3.3	认同效应·····	87
2.3.4	逆反效应·····	90
第四节	翻译批评的客体·····	91
2.4.1	中国译界对翻译批评客体的认识·····	91
2.4.2	翻译批评客体的构成·····	94
2.4.2.1	译者·····	97
2.4.2.2	译作·····	99
第三章	翻译批评的标准·····	111
第一节	翻译批评有无标准·····	112
第二节	翻译标准与翻译批评标准·····	116
3.2.1	翻译标准与翻译批评标准的异同·····	116
3.2.2	翻译标准与翻译批评标准的关系·····	119
第三节	翻译批评标准的设定和依据·····	120
3.3.1	翻译批评标准的设定·····	120
3.3.2	设定翻译批评标准的依据·····	127
3.3.3	翻译批评标准与价值判断·····	131
第四节	翻译批评阐释的“度”·····	133
第五节	翻译批评标准的性质·····	139
3.5.1	翻译批评标准的历史性·····	139
3.5.2	翻译批评标准的多样性·····	144
3.5.3	翻译批评标准的关联性·····	145
3.5.4	翻译批评标准的特殊性·····	145
3.5.4.1	翻译批评标准的非普适性·····	146
3.5.4.2	翻译批评标准的非证伪性·····	147

3.5.4.3 翻译批评标准的非操作性·····	149
3.5.5 翻译批评标准的多维并存性·····	150
第六节 译作的效果评价·····	151
第四章 翻译批评的方法·····	161
第一节 翻译批评方法研究的历史回顾·····	162
第二节 翻译批评方法的概念·····	167
4.2.1 翻译批评方法的概念·····	167
4.2.2 翻译批评方法的层次·····	168
4.2.3 翻译批评方法的本体特征·····	170
第三节 翻译批评方法的介入·····	175
4.3.1 翻译批评方法的介入·····	175
4.3.2 翻译批评方法介入的途径·····	177
第四节 翻译批评的具体方法·····	180
4.4.1 翻译批评方法的原则·····	180
4.4.2 翻译批评的具体方法·····	182
第五章 结语·····	211
参考文献·····	219
后记·····	239

绪论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的改革开放大潮,对我国的翻译研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观念的更新,方法的多样化,使翻译研究的领域不断扩大而呈现出勃勃生机^①,在二十多年的发展演进中,“已透露出将历史的民族视野、现实的发展视野与新学科的多元视野相融合的内在需要”^②(屈雅君,1997)。几乎所有的翻译理论家都在关心着这样一个问题:在全球性话语的背景下,翻译学的建设将如何进行?他们自觉地投入到对古往今来,特别是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翻译研究的回顾与反思之中,并试图经过一番冷静的梳理、提炼和总结,有效地吸取已有的经验教训,进而建立起新世纪的崭新译坛。^③

翻译批评作为翻译学的三大支柱之一(其他两个为翻译理论和翻译史),“作为检验翻译学的一个关键准则”(维尔斯,2001:217),也是理论家们回顾与反思的焦点之一。^④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一系列的问题:

- ① 从简单的语言学派和文艺学派二分法,到功能学派、语用学派、符号学派、解构学派、女性主义学派、多元体系学派、描写学派、文化学派等令人眼花缭乱的各学派,在中国都有自己的倡导者和实践者。
- ② 这是屈雅君对新时期中国文学批评研究的总结。笔者认为,用其描述我国当前的翻译研究亦十分恰当,故作此引述。
- ③ 据笔者手头掌握的资料,从 20 世纪 90 年代至今,我国译界对翻译研究的反思和构想都是积极的。仅以《中国翻译》为例,从 1990 年至今,共有五十多篇文章对我国的翻译研究和译学建设进行了反思、构想和展望。如果加上其他报刊、杂志的有关文章,如《外语与外语教学》有关翻译学的大讨论、《上海科技翻译》有关翻译理论与实际的大讨论,数目还是相当可观的。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我国译界对翻译学科建设和发展的普遍关注和焦虑。
- ④ 霍姆斯(J. Holmes)1972 年在哥本哈根召开的第三届应用语言学会议上发表了《翻译学的名与实》(“The Name and Nature of Translation Studies”)一文。这篇文章被“普遍认为是翻译学学科的创建宣言”(Gentzler, 1993: 92)。在这篇“宣言”中,霍氏提出了他的译学构想。1988 年,他又对该论文进行了修改补充。1995 年,图瑞(G. Toury)在《描写翻译研究及其他》(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Beyond)一书中,将霍姆斯的译学构想绘成图形。在这个译学构图中,翻译批评被列为应用翻译研究的一个分支。详见张美芳:《翻译学的目标与结构——霍姆斯的译学构想介评》,载《中国翻译》,2000 年第 2 期,第 66~69 页。

中国的翻译批评有没有自己的传统理论基础？如果有，这些传统理论是否具有当代价值？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随着西方译论的大量译介，中国的翻译批评经历了怎样的冲击？发生了哪些变异？形成了哪些既不同于中国传统，又不同于西方的翻译批评理论？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的翻译批评取得了哪些成就？还存在着哪些问题？当前的翻译批评家和翻译研究工作者还需要做哪些工作？未来的翻译批评会呈现出什么样态？具有怎样的特征？

这些都是需要——作出回答的问题。

第一节 翻译批评研究的传统理论基础

中国的翻译批评有没有自己的传统理论基础？这是我们进行翻译批评研究首先要加以回答的问题，因为没有对历史的审视，就找不到现实的起点。对这一问题，我们的回答是肯定的。中国具有两千年的翻译史，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我们不仅生产出浩如烟海的译作，而且也在无数的实践中形成了一套“自成体系的翻译理论”^①（罗新璋，1984）。这套理论不仅一直是我們从事翻译实践的重要指南，而且也一直是我們进行翻译批评的坚实基础，这是不以任何人的主观愿望为转移的客观存在，它既不会因我们对它的尊崇而裹足不前，也不会因我们对它的蔑视而自行消亡。从三国时期支谦写《法句经序》开翻译批评之先河始，一直到 21 世纪的今天，中国的翻译批评虽然有高潮有低谷，但它始终是与具有鲜明民族特点的文艺理论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翻译理论与翻译批评在借鉴、移植中国传统文论的基础上，得以不断发展。在《法句经

① 罗新璋在《我国自成体系的翻译理论》（载《翻译通讯》，1983 年第 7 期）一文中，对中国汉唐佛经翻译至钱锺书的翻译理论研究进行了详尽的考察，提出：“案本——求信——神似——化境”四个概念，既各自独立，又相互联系，渐次发展，构成一个整体；而这个整体，当为我国翻译理论体系里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朱纯深对此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中国传统的翻译理论只是一些“偏论”、“散论”而非“主论”，说其自成体系在逻辑上和认识上是值得商榷的（参见《走出误区，踏进世界——中国译学：反思与前瞻》，载《中国翻译》，2000 年第 1 期，第 2~3 页）。

序》中，支谦以老子“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和孔子“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的语言艺术和哲学思想，对蓝调、安侯、世高、都尉、佛调、维祇难、竺将炎 的译经进行了批评。通过批评，他指出了译事的不易——名物不同，传实不易；提出了翻译的原则——因循本旨，不加文饰；反映了早期“质派”的译学观点——其传经者，当令易晓，勿失厥义（陈福康，1992：16）。这篇译经序言既是我国翻译批评的开河之作，也是我国探讨翻译理论的奠基之作。其史学意义在于：首次向我们指出了翻译的困难，并勾勒出文、质之争的原始概貌，对后世翻译理论的发展具有先导作用。^①在此后的漫长岁月里，随着翻译实践的不断丰富，我们的先辈译论家们对翻译的认识也不断发展，逐步形成了以“信达雅”思想为核心的、多种学说共存的翻译思想体系。它们不仅在我们长达两千年的翻译史上，指导着译者们的实践，同时也是译评家们实施批评的主臬，是一种最为纯粹的民族批评样态，反映了我们民族特有的思维方式和对翻译的理解。事实上，意境、形神、风骨、言不尽意等文学观念和范畴在今天的翻译批评中仍牢牢地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以各种不同的言说方式呈现出来。只是在西方的翻译理论涌入以后，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后期，随着中国译界翻译批评理论化呼声的高涨，它们开始变得含蓄起来，常常披上新概念的外衣，以一种非自觉的、被动的状态存在着。近几年来，随着翻译研究的不断深入，许多当代译论家开始尝试用现代、科学的方法对它们进行诠释，赋予其全新的解释力，以使它们堂而皇之地步入当代译论的“神殿”，继续指点江山。如王宏志的《重释“信、达、雅”——论严复的翻译理论》（1997），从严复自己对信、达、雅的解释入手，澄清长期以来人们对这一理论的误解，同时把严复的见解跟当时的社会思想、文学及政治理论联系起来，从而使得严复的理论具有了某种类似于勒弗维尔（André Lefevere）三因素的色彩；沈苏儒的《论信达

① 刘超先在《道安——我国翻译批评的先驱》（《中国翻译》1993年第3期，第51~54页）一文中指出，“我国翻译批评的历史有文字可考者也可追溯到公元四世纪。早在东晋时代，学识卓越的佛教领袖道安就拉开了翻译批评的序幕，为后人树立了光辉的典范。”我们认为，刘先生对道安在翻译批评史上的贡献之定位是准确的、恰当的，但若将其说成是翻译批评的首创者则不足为训。因为，就目前的翻译史所提供的资料而言，支谦的《法句经序》无论从时间上，还是从内容上，都应当是翻译批评的先河之作。

雅——严复翻译理论研究》(1998),通过对一百年来国内译界对“信达雅”的各种评价和新说的梳理和阐释,“探索其生命力之所在,找出其‘合理的内核’,予以继承,加以发展”(见该书绪言,第11页),同时通过与我国流传较广的几种外国译学学说的比较,将严复的“信达雅”之说置于一个国际学术的大背景下进行剖析,就严复翻译理论对翻译实践和跨文化交流活动的指导价值进行了分析(许钧,1999:47~48),从而将对严复译论的研究与建设我国现代翻译理论体系的努力联系起来(见该书绪言,第13页);江帆的《“化境”的再阐释》(2001)从“化”字出发,进一步阐释了“化境”的内涵,将其具体化、系统化,从而使其具有对当代翻译批评的指导作用;穆诗雄的《翻译标准与翻译目的、对象和语篇类型——重温严复的译论》(2001),从对翻译批评的三个主要因素——翻译的目的、对象和语篇类型的论述出发,赋予“信达雅”某种目的论和接受美学的内涵,使其具有当代理论形态的意义;王宏印、刘士聪的《中国传统译论经典的现代诠释》(2002),通过对中国传统译论的现代诠释,使它们“合乎历史和合乎逻辑”地发展成为现代译论;李文革的《语用合一,意境再现——“化境”的符号学途径阐释》(2003)则运用符号学的翻译观为如何达成“化境”提出了相应的层次、步骤和途径。这一切都是中国译界对传统译论的现代价值的思考,无论是对翻译理论的建设,还是对翻译批评的理论化诉求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传统文化在面对西方外来文化影响时,常常会自觉不自觉地进行抵触,“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始终根植于国人的心中。表现在学术研究上,就是在引进西方学术思想时,对它们进行改造,以为我所用。因此,当新时期国门打开之际,我们对西方的理论普遍地表现出欢迎的姿态,但在接受的过程中,又自觉不自觉地到我们的传统中寻找支持。以奈达理论为例,由于中国传统批评观念中重神似的美学思想所致,“中国的译者在翻译时,心中总是装着读者,并使自己的译文从言辞上适应读者的需要”(Chinese translators did translate with a certain audience in mind, and they would rhetorically adapt their translation to that audience. Bassnett, Lefevere, 2001:18)。此外,“因为中国文化的非宗教化和世俗化倾向,中国的翻译始终是面向大众的而

不是面向少数教徒的，即便是佛经的翻译也有此倾向”（王宏印，刘士聪，2002：9）。因此，当它在改革开放之初，和十分关注读者等效反映的奈达的动态对等理论相遇时，两者便一见如故，一拍即合。^①这也正是在数不清的西方翻译理论中，为什么独有奈达的理论在中国译界能够掀起最为巨大的波澜，也正是当奈达理论在西方引起普遍怀疑和冷遇时，为什么能在中国找到知音的原因之一。与此同时，我们的“信、达、雅”也通过“重新界定”、“充分发挥”和“根本改造”（王宏印，2002：242）顺理成章地进入现代中国译坛。它将等值、等效理论的文体学理论、接受美学理论、信息理论融进了自己的系统，因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获得了新生。这种新生也可以说是对西方翻译理论的一个接受和改造的过程，这种接受和改造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相互矛盾的方面：

一、对西方译论的盲目崇拜。传统上，中国人一向尊崇权威，做学问、写文章，常借圣人之口言自家之说。奈达、纽马克等西方译论进入中国之后，就享受到这种中国式的礼遇。于是我们看到，曾经一度，理论家、批评家们言必奈达，书必纽马克，事事要在他们的著作中找依据。而在奈达和纽马克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时，解构主义、女性主义、后现代、后殖民等主义又蜂拥而来。当德里达、本亚明、韦努蒂、勒弗维尔、巴斯奈特、斯坦纳、根茨勒、埃文—佐哈尔、图瑞等名字在我们的话语中被一次次言说的时候，它表明了我们自身对“传统”的缺乏自信。不少学者对西方翻译理论击节欢迎、大唱赞歌，而对中国传统翻译理论却悲观失望，甚至全盘否定，认为中国根本就没有翻译理论，有的只是“意见”，是“偏论”、“散论”而非理论^②（朱纯深，2000：2~3）。对于翻

①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奈达理论在中国的命运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其中可能有历史的原因、文化的原因、某种需要的原因等等，这里我们只想以它在进入中国时受到高度礼遇的事实为例，说明我们对待外来文化时的普遍态度，而并不打算对其中的原因进行全面的分析和探讨。

② 董秋斯早在1950年的时候就曾指出：“我们中国，虽然有一千几百年的翻译经验，从事翻译的人也是以千计以万计的，但是研究翻译的人，几乎可以说没有。我们所有的，是一些供零星参考的翻译条例和片断的经验之谈。尽管这些东西是很可宝贵的，有过很大的功效，但是，无可讳言，不能合成一个体系。一种体系的构成，是一种广泛地调查研究的总结。”参见《翻译研究论文集（1949-1984）》，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5~29。此外，王宏印和刘士聪在《中国传统译论经典的现代诠释》一文中也对中国传统译论的“缺陷和匮乏”进行了讨论。参见《中国翻译》，2002年第2期，第9页。